

原始文化名著译丛



刘魁立 主编

〔英〕爱德华·泰勒著

连树声译 谢继胜 尹虎斌 姜德顺校

原始文化

神话、哲学、宗教、语言、
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原始文化名著译丛

原始文化

刘魁立主编

〔英〕爱德华·泰勒著

连树声译 谢继胜 尹虎斌 姜德顺校



神话、哲学、宗教、语言、
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据 1929 年伦敦版翻译

责任编辑：刘东远
封面设计：何礼蔚

原始文化

〔英〕爱德华·泰勒著

连树声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 插页 2 精 6 字数 769,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装 1—2,000 册 精装 1—500 册

ISBN 7-5321-0553-9/I·440 定价：11.75 元（平装）

ISBN 7-5321-0554-7/I·441 定价：18.05 元（精装）

（沪）新登字 103 号

中译本序言

刘魁立

任何一种新的、朝着正确方向改变人们对事物旧有看法、从而真正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人类认识进程的学说，都是现实的：适应现实的需求而孳生，基于对现实的深入分析而提出；同时它也是历史的：既是历史成就的总结和继承，又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

19世纪下半期欧洲的文化学崛起于英国，爱德华·泰勒(1832—1917)于1871年出版的这部《原始文化》是这一学科诞生的一个标志。

1848年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欧洲大陆所受的震荡尤为强烈。对于理论研究怀有浓厚兴趣、而且取得卓著成就的德国，也失去了昨日的光辉。在文化研究领域，影响颇大的德国比较神话学、民族学，兴盛不久便开始冷落起来。唯有英伦三岛的知识界，似乎受时潮波及略少，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领域……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禁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在研究个别事

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在德国。^①

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在1859年推出《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达尔文学说被恩格斯称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它在广泛领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爱德华·泰勒正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尽管他本人在第二版的序言里，在肯定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理论建树和巨大影响的同时，断然否认自己同他们的思想联系），对原始民族的诸多文化现象，以及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在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开创了文化学学科的先河。

爱德华·泰勒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青年时代，父亲要他继承家传的铜厂，从事实业，但这并非是他心之所钟。在他因病去古巴疗养期间，结识了当时在该地的酷爱考古学研究的一位英国银行家。这次机遇，改变了泰勒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契机，使他最终成为一个成就卓著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此后若干年里，他一直潜心搜集和研究中美洲的民族学资料，发表了一系列论著，特别是1865年发表的《人类早期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书中第一次阐述了人类文化不断进步的思想。这些早期著作都为他以后撰写《原始文化》一书，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学科的独立存在，要求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基本问题，特定的体系和构成，特定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原始文化》一直被文化学史的研究者们视为这一学科的开山之作，原因在于泰勒勾勒了文化学的基本轮廓，提出自己关于文化学的对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范围、原则和方法等的明确的见解。他在本书第一章《关于文化的科学》中,开宗明义,提出文化的定义,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还经常被许多学者沿用或征引:

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本书第1页)

这既是他为“文化”所下的定义,也是他为“文化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特别是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详密深入的独创性的研究,并且阐述了他关于文化发展阶段和脉络的见解。他在十年后又出版了《人类学》(1881)一书,以原始人的某些物质文化现象作为自己侧重研究的对象,发展和补充了他在《原始文化》中的探索和研究。

杂沓而纷乱的诸多文化现象摆在人们面前,使人眼花缭乱,难以理出其中的头绪,而泰勒在进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之前,或者说,在对如此纷繁的、有时甚至是杂乱无章、彼此矛盾的文化现象进行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两大原则:第一,他认为诸多文化现象有着广泛的共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相同的理由说明相同的现象,对各种文化现象,可以用普遍的原理去进行研究;其次,他认为,文化的不同阶段是文化发展和进化的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影响于未来发展的进程。

这两大原则的提出,当然是他对于文化学的贡献。但也所来有自,并非是他特有的发明。他赞赏自然科学部门的研究家们能够态度鲜明地承认自然的统一性、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和因果一致;赞赏他们关于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和历史连续性的观点。他像在文化领域里的同时代以及后起的所有达尔文学说追随者们一样,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他认为:

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或者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是和那些像支配着波的运动、化学元素的化合及动植物的生长的如此确定的规律相适应的。(本书第2页)

泰勒大量地运用了民族学已经取得的资料和成就，并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当时正值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原始文化史家摩尔根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学家，大力推行实地考察的方法。这种充满生机的学术实践活动，不仅为他的著作增添了极为丰富的、科学性很强的资料依据，同时这种方法的运用，也使他的许多论述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切实的说服力。他在研究中严格贯彻的口号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判断，用新的事实来检验它。”此时，比较研究法，经过语言学家、神话学家、历史学家等的热心倡导，已经日趋完善。泰勒把比较研究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之一，广泛地加以运用。他“特别注意将落后部落的文化和先进民族的文化加以对照”。在对文化现象的发展进行历史研究时，泰勒还广泛地运用由他自己创立的“文化遗留”研究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还要谈及。

泰勒把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和阶段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之一。不仅对具体文化现象进行阐释，而且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进行理论观照，这对文化学学科说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人类社会漫长发展的主要倾向，是从蒙昧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文化的发展也是按照泰勒时代所划分的人类发展阶段，“依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阶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本书第31页)“高级文化就是从人类的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传播起来的。同时，归根到底是，一般进化远比退化更占优势。”(本书第31页)泰勒之所以着力阐释这一“不只是真理、而且甚至是妇孺皆知的真理”的进化论观点，其原因在于，在他生活的时代，退化论和神学还在顽强地影响和束缚着一部分人的历史哲学研究。颇具影响的法国哲学家约瑟夫·梅斯特在19世纪初声称：“我们始终根据陈腐的假设断定：好像人逐渐从野蛮上进到科学和

文明。这是一种可心的幻想，是当代谬误、谎言的鼻祖。”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不幸时代”的哲学家，说他们极端堕落和愚昧无知。这种退化论不仅获得了某些“博学之士”的赞扬，而且受到神学的怂恿和支持。泰勒的文化进化论就是在同这些反动学说的斗争的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泰勒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和胆识指出：

文化起源的问题还常常被看作是教条主义的神学研究对象。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听大主教的声明：民族学者们的理论认为人是从完全蒙昧的状态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欺人的无稽之谈，因为从“神启”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人的状态一开始就是高级的。但是，请教一下“圣经”评论家，我们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新神学家远不采纳这一教条。此外，在研究远古文化问题的时候，力图把科学观点建基在“神启”上，这本身就不能不引起反对。我认为，假如学者们已经在天文学和地质学的例子中看到了企图把科学建基在宗教上的可悲的结果，又在民族学中支持同样的企图，那是不可饶恕的。（第35—36页）

这里必须指出，泰勒的文化发展论也有其致命的缺陷，他把文化现象的发展，仅仅归结为文化现象内部因素由简至繁的演进，数量的减少和增加。他不仅没有看到文化现象发展过程中的质变，而且也极少关心文化现象内部诸多因素间的有机的联系和彼此制约。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没能揭示历史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关系，更没有阐明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存在对于精神文化所具有的巨大作用。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肇兴和发展，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伟大发现，已经贡献在泰勒时代的学术界面前了。

为了把握文化现象的历史联系，泰勒提出关于“文化遗留物”的研究，以此作为解开文化现象演进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那些帮助我们按迹探求世界文明的实际进程的证

中，有一广泛的事实阶梯。我认为可用“遗留”(Survival)这个术语来标示这些事实。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本书第15页)

泰勒认为，遗留物研究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他把许多原始文化现象都归结为遗留物的范畴。此外，他断定不论遗留物本身怎样地微不足道，而遗留物的研究定然有助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发现。于是他不但把了解遗留物的本质看成是民族学和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当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文化遗留物学说，是泰勒的理论贡献之一。这一学说被科学发展的历史所继承，至今尚被许多学者所称道，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沿用。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这种文化遗留物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创始人泰勒夸大了。文化学家不仅要研究文化现象当中的继承的因素并对它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应该对新生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特点、原因、功能等等进行深入地探索，这也是他无可推诿的重要天职。如果也拿自然科学领域的例子打个比方的话，那么，当我们观察和研究一株蓬勃生长的抽穗结实的麦谷时，怎么可以单单把目光全部集中在那永埋根下、已经干瘪变形了的麦种的身上呢？

过分地责难泰勒也是不公正的。应该说，他的文化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倾向，对于当时时代是进步的。他说：

对于进步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科学文化，比较高层次的态度应该是，尊敬前人，但不卑躬屈膝；从过去获益，但不为了过去而牺牲现在。但是，甚至当代的文明世界，也只是学会了这种思想方法的一半；公正的研究，可以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观念和习俗中许多东西的存在，与其说是因为它好，不如说是因为它老。但是，当我们遇到有害的迷信的时候，我们掌握了这样的事实，这事实证明了迷信是蒙昧文化所特有的，是同高级

文化不相容的东西，而高级文化是力图消灭它们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些迷信做斗争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本书第164页）

一提起泰勒的名字，就必然地使人同时联想到他的另一个科学发现，即“万物有灵观”。“Animism”这个词过去一直被译为“万物有灵论”或“泛灵论”。从中国的习惯说来，“论”意版着一种学说的体系，如果所指的确实是这种情况，“-ism”译为“论”当然的贴切的，但关于原始人的灵魂信仰和精灵信仰的观念，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普遍意义，也不宜说成是一种学说体系，所以我一直主张这一词应有两种译法：一为“万物有灵观”，一为“万物有灵论”。应根据所指或为观念、或为学说的不同，分别选择不同的译法。

泰勒认为，作为对灵魂和精灵普遍信仰的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的最显著的特点。它不断演化流传，在此过程中虽然发生深刻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完整的连续性，并进入现代文化之中。他认为：“万物有灵观既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同样也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本书第414页）由于泰勒赋予万物有灵观这样重大的意义，所以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没有像在教科书里那样，均衡地分述文化的诸多构成方面，而把本书差不多一半的篇幅，献给了关于万物有灵观的考察和阐释。

根据泰勒的研究，处于低级文化阶段的人，在思考人的生与死中差别，思考清醒与睡眠的状况、健康与疾病的原因，思考梦幻中之所见等问题的过程中，推导出人的第二个“我”，即灵魂的存在，进一步又推导出这灵魂能够离开肉体，或者进入动物，或者进入其他物体，支配他们，影响他们。泰勒发现，万物有灵观包括两大信条，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相信所有生物的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后，仍能继续存在。第二，相信各种神灵可以升格，进入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可以影响和控制物质世界和人的今生来世。神灵和人又是相通的，人可能引起神灵的高兴和不悦。这种信仰自然会发展成为对它们的崇拜。充分发展起来的万物有灵

观就包括了信奉灵魂和未来的生活。这些信奉又在实践中转化为某种实际的崇拜。

据此，泰勒提出了万物有灵观的宗教起源论，并且对宗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定义。他认为，应当“简单地把神灵信仰判定为宗教的基本定义”。（本书第 412 页）这种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观的学说一经提出，便赢得了学术界的首肯和赞许，一时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前此不久还风靡欧洲的、由格林兄弟等德国神话学家首倡、由出身于德国、执教于牛津大学的麦克斯·缪勒总其大成的关于宗教起源于自然神话的理论，在这种形势下，顿时变得黯然失色了。

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极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运用到宗教史的研究当中，这在建立科学的宗教理论的历史进程中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他对万物有灵观进行的十分详密而精微的考察，体系完整，思路开阔，分析精深，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然而由于他特别地热衷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所以在一些场合便不无勉强地把万物有灵观认作是大量原始文化现象赖以发生、发展的认识基础了。

神话，也是泰勒以极大的热情和专注的精神进行研究的对象之一。当然使他感兴趣的并非是关于神话的本体研究，他更多的是把神话当作认识人类思想的历史和发展规律的一种手段。

他认为，“神话的发生和最初的发展，想必是在人类智慧的早期儿童状态之中”。这种把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化现象的论点，首先是由生于 17 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现在在泰勒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在《原始文化》出版前的若干年里，神话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缪勒的语言起源论（或称“语言疾病说”）。缪勒认为，在人类发展的一定时期，由于语言的连续不断的变化演进的链条，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被历史割断了、淹没了（或者说，由于词汇自身由繁杂向简明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前人的语言在后人的理解上产生了障碍），致使前人的明白的叙述，变成了后人的充满奇异内容的神

话。^①而泰勒则认为,日常经验的事实才是神话的基础。这自然要比他的前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这里,他也发挥了他所创造的关于万物有灵观的学说,他断定“日常经验的事实变为神话的最初和主要原因,是对万物有灵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达到了把自然拟人化的最高点”。(本书第 285 页)但他并没有全然否定缪勒等人的研究成果,他并不排斥在神话形成过程中语言因素的作用。但认为那只是后一时期的事情。因此,他说:“把个体生命一般地妄加到全部自然身上的这种幼稚的、原始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对人类智力的早期统治,也许是神话发展的最伟大的两个推动者。”(本书第 305 页)

《原始文化》规模宏博,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泰勒首先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把自己的这部书看成是民族学著作。这也很自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发展正逢鼎盛时期,它向外大肆扩张,拥有无数的殖民地,因而享有“日不落帝国”之称。民族学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有利的蓬勃发展的机会。但是泰勒的《原始文化》作为一部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著作,它的成就同样也是多方面的。他首次在英国建立文化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基本轮廓,积极倡导文化进化论,因此被后世推崇为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宗教学领域,开始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涤荡陈见,创立新说,因此他的《原始文化》被宗教研究家们视为宗教学的经典论著之一。在民族学领域、神话学领域创立了所谓“人类学派”,至今影响犹在。

他的学说刚一出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轰动。他的《原始文化》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英国,在这部书出版的当年,作者即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80 年在他的影响下,牛津大学建立民族学博物馆,泰勒成为第一任馆长,并在他手下组织起一批研究力量。在英国的大学里,长期未设教授有关原

① 参见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始社会知识的课程。直至 1896 年才在牛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学教研室,泰勒便成为牛津大学的、也是整个英国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泰勒在退休数年之后,于 1912 年受封为爵士。1917 年逝世,享年 85 岁。

泰勒于 1881 年出版《人类学》之后,著述甚少,偶尔运用其他方法(统计方法)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新的尝试。这说明他对自己所获得的成就并不满足,并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它的某些缺陷。然而要进行根本的改造,已经是他力所不及的了。

一个真正意义的科学家,不论他从事的是什么学科,总会把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作是自己工作的宗旨。这也是泰勒的追求。一个多世纪以前,他在《原始文化》一书的结论中写道:

要使人们头脑中铭刻下一种进化发展学说的印象,就要使他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以继续从事往昔的进步工作,更加拼命下去……民族学的职责,在于揭示那些粗糙而古老的文化中的遗留物,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有害的迷信,民族志注定要把它们淘汰掉。这样做比较严厉,有时甚至令人痛心。然而,这件工作假如不那么适宜,它对人类的利益来说也就不那么迫切需要了。因此,文化学便立即积极主动地前来帮助进步、消除障碍,它本质上是革新者的科学。(本书第 872—873 页)

这些话是泰勒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概括,而我们则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的昭示和勉励。

第一版序言

《原始文化》与我先前出版的《人类早期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1865年第一版;1870年第二版)两部著作是对涉及思想、信仰、技艺和习俗等其他分枝的文化的调查研究。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我就尝试性地提出了本书论述和讨论的一些主要观点。早期人类文明中的一些问题,如文化遗留的规律,直接表达的语言的效能,数字的发明,在人类意识的早期历史中神话的位置,万物有灵宗教哲学的发展,仪式和庆典的起源等等,在本书对其大规模系统编排之前,我在各类论文和讲座中已经做了阐述。^①

本书所引用的材料的出处,我在脚注中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我有责任向记述这些材料的文化人类学和邻近学科的学者、历史学家、旅行家和传教士表示感谢。我仅仅能提到我曾专门使用过两篇论文:一篇是柏林巴斯蒂安教授(Prof. A. Bastian)著的《历史

① 参见《语言的起源》(Origin of language),1866年4月15日出版;《野蛮人的宗教》(Religion of Savages),1866年8月15日出版;在皇家研究员的讲座:《人类早期的智能条件溯源》(Traces of the Early Mental Condition of Man),1867年3月15日;《现代文明中的原始思想残留》(Survival of Savage Thought in Modern Civilization),1869年4月23日;《人类低级种族的精灵哲学》(Spiritualistic Philosophy of the lower Races of Mankind),1869年5月8日在伦敦大学所讲;1866年在大英学会(British Association)宣读的论文:《野蛮部落中初步形成的文明现象溯源》;1870年4月26日在伦敦人类学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宣读的论文:《人类低级种族中的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 among the lower Races of Mankind)等等。——原注

上的人》(Mensch in der Geschichte)^①，另一篇是墨尔本韦兹教授(Prof. Waitz)著的《原始种族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

在讨论诸如文明的发展之类非常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要是用很少的材料作旁证，还不足以提出理论。材料例证的叙述必须配合书中论述的主题。只有在每一章节段落阐明基本要旨时才深入到有限的细节材料中去，以便将新采录的材料作为已建立起来的新规则的例证分布在书中合适的位置上。对一些读者来说，我在论述过程中由于试图深入阐述而使用的有限的细节也会导致许多烦琐细节材料的堆积。应该指出，由于理论的新颖创见与提出的许多问题的实践的重要性，限制具有充分论据作用的细节材料数量的作法是很不明智的。过去十年时间我主要花在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上，从浩如烟海的记录材料中选择最有说服力的文化人类学材料；为了使关于某一论题的资料数量减少到能说明问题的最低限度，我还删掉了很多不必要的材料。

E·B·泰勒

1871年8月

① 巴斯蒂安是德国一名医生兼民族学家和旅行家，代表作是《历史上的人》，此外还有《东亚民族》(Die Völker des östlichen Asien 1866—1871)、《古代美洲的文明》(Die Kulturländer des alten Amerika, 1878—1889)、《民族学史前史》(Vorgeschichte der Ethnologie, 1881)等著作。他对民族学的研究主要在于理论上的三个贡献：即①原始观念；②民族观念；③地理区域。西方有人称他为民族学的开创者。——译注

第二版序言

自《原始文化》于 1871 年出版以来,已经有了德文译本和俄文译本。利用这次本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再版的便利条件,在此版中对第一版的版面格式略作变动,但书中的内容未做实质性的改动,只有很少一些段落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或为了行文利落而作了调整,在这一版中插入了说明一些论点的额外的或经过改进的论据。一些人类学家发表了对本书的评论和他们的个人见解,促使我对各种观点做了修正和补充。在这些人类学家中我只能提到列日(liege 比利时城市)的费利克斯·利伯特教授(Felix Liebrecht)、克莱门茨·R·马卡姆先生(Clements R. Markham)、考尔德伍德教授(Calderwood)、罗尔斯顿先生(Ralston)和塞巴斯蒂安·埃温斯先生(Sebastain Evans)。

有一件事可能令读者感到震惊,那就是由于我的疏忽,在这样一本竭力倡导文明进化和发展理论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达尔文先生(Darwin)和斯宾塞先生(Herbert Spencer)^①。他们在文明的进化和发展方面对人类现代思想的整个进程的影响得到了世人的公认,是不应该在书中将他们忽略的。我的这部著作缺少他们的著作作参考资料,是因为本书的安排有自己的脉络,与先前出版

① 斯宾塞(1820—1903) 英国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西方学者认为斯宾塞和孔德是社会学的两位开创者。它的哲学著作自成体系,称《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其中有《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和《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他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也叫进化论派社会学,或社会有机体论。——译注

的这些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

至于一些评论家对我这几卷书中论据材料堆积的批评，我自己真情欣慰的表示，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已被它所固有的优势抵销。搜集大量的详细的论据材料的目的是为了使得读者在认识理论之前事实上具有鉴别所提出的理论正确与否的工具。这一方案已被本书的接受者们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材料叙述的许多观点是矛盾的，但材料本身还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从语言学院和神学院出来的学者现在都承认，民族学的材料是真实的、生动的，必须对它们作出解释。并不是说可以理解的公众的评判在这里就已经证明了英国人的意识不能很容易地被诡辩术左右，而是在事实材料的支配下自由地发展这一成说是正确的。

E·B·泰勒

1873年4月